

抗战后期保定商业管窥

——以1944年“保定杂货业同业公会商店名簿底册”为中心

唐 晔

【提 要】“保定杂货业同业公会商店名簿底册”(未刊稿)反映了20世纪中叶保定商业在企业组织形式以及市场网络等方面的进步。这显示了当时冀中地区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趋势,但是这种市场因素的渗透是受外部技术进步影响而产生的一种被动反应。

【关键词】抗战后期 杂货业 保定 商业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1)02—0048—07

冀中地区无疑是窥探近代华北地区社会经济的理想窗口,中外学者关注此地由来已久。^①保定地处冀中平原中部,坐落于京、津、石三角地带的中心位置,是近代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城市之一。目前学术界对于近代华北地区商业的研究方兴未艾,现有成果大多集中在天津、唐山等新兴城市,或是将华北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对于保定这样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城市的研究则相当薄弱,这与保定在近代的重要地位很不相符,^②也影响到了对华北地区商业史的探讨,这主要是资料匮乏使然。本文是笔者利用河北大学新近整理的“保定商会档案”(尚未出版)中的“保定杂货业同业公会商店名簿底册”(以下简称“名册”)对探索20世纪中叶保定商业状况所作的一次尝试,希冀能对研究近代冀中地区的商业史有所裨益。

一、“保定杂货业同业公会商店名簿底册”基本情况

该“名册”系保定杂货业同业公会于1944

年1月报送商会的底本。册中共载有行内全部22家商号记录,^③所列项目包括“商店名,经营者、本籍、住所、家庭情况,营业品目,资

① 近代以来,中外学者曾对这一地区作了大量调查报告,较有影响的主要有: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李景汉、张世文分别作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定县农村工业调查”;中央研究院社科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1929年~1998年间所作的四次“保定、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有中央研究院张培刚的《清苑农家经济》、曲直生的《河北棉花出产及贩运》等。

② 目前就笔者所见有关保定社会经济的较有代表性的专门研究成果只有两篇硕士学位论文:王志勇的“近代保定天津城市发展比较研究(1840~1927)”、赵金辉的“京南屏翰保定城市发展研究1644~1911”。

③ 按照当时规定,同一行业有7家以上商号,须组织同业公会且业内所有商号必须参加,因此基本可以认定“名册”涵盖了行业中全部商号。另据核对民国32年(1943年)10月报送河北省警察署“保定市杂货业同业公会商店字号表”及民国33年(1944年)1月报送河北省警察署经济课“杂货业各商号名簿”,都可以确认“名册”记录完整,没有漏缺。参见河北大学保定档案馆整理《保定商会档案》第1卷第5册(即将出版),第461~482页。

本系统，经营别，资本金（现在），仕入先，贩卖先，家族及使用人状况”，各项内容填写都较为详细。表 1 即为根据“名册”中部分项目所

作的表格，作者将参照该表中内容，论述抗战后期的保定杂货业基本情况。

表 1 保定杂货业商号基本情况表

| 商号名称 | 资本金 (元) | 员工人数 | 营业类别 | 经营范围 | 进货地 | 销货地 | 资本构成 |
|-------|------------|------|----------------|----------------|----------------|---------------------------|------|
| 金成元 | 1000 | 5 | 零售 | 碱面、肥皂等 | 天津、本市 | 本市城关 | 合资 2 |
| 庆昌公 | 3100 | 10 | 卸卖及小卖 | 土产杂货 | 天津 3、本市 3 | 本市、石门 2、正定 1、定县 1、高阳 1、徐水 | 独资 |
| 德聚涌 | 4000 | 3 | 批发 | 土产杂货 | 北京 | 本市 | 独资 |
| 义顺合 | 4800 | 16 | 卸卖及小卖 | 土产杂货、酱园 | 天津 1 | 本市、高阳 1 | 合资 3 |
| 聚兴顺 | 5600 | 8 | 卸卖及小卖 | 土产杂货 | 天津 6、北京 1、青岛 1 | 石门 6、定县 5、博野 1、高阳 4、正定 2 | 合资 7 |
| 福记忠信厚 | 8000 | 2 | 配给 | 火柴、砂糖 | 天津 | 本市 | 独资 |
| 庆升恒 | 9400 | 16 | 卸卖及小卖 | 土产杂货 | 天津 12 | 本市 12 | 合资 3 |
| 镒生昌 | 10000 | 19 | 卸卖及小卖 | 土产杂货、酱园 | 天津 4 | 定县 2、望都 3、本市 2 | 合资 5 |
| 泰丰庆 | 10000 | 17 | 卸卖及小卖 | 土产杂货、酱园 | 天津 3 | 本市 5、顺德府 4 | 独资 |
| 元兴裕 | 12000 | 13 | 卸卖及小卖 | 土产杂货、酱园 | 天津 6 | 本市 3、蠡县 2、望都 1、高阳 1 | 合资 3 |
| 聚泰昌 | 13000 | 22 | 卸卖及小卖 | 土产杂货、酱园 | 天津 4、本市 | 本市 2、徐水 2、望都 2 | 合资 7 |
| 聚合成 | 15000 | 25 | 卸卖及零售 | 土产杂货、酱园 | 天津 8 | 天津 3、徐水 2、定县 7、望都 6 | 独资 |
| 魁盛鸿 | 19000 | 20 | 卸卖及小卖 | 土产杂货、酱园 | 天津 8 | 本市、石门 1、定县 1、新乐 1、长寿 1 | 独资 |
| 永进 | 20000 | 6 | 配给 | 石油、火柴 | 天津 | 本市及周边县 | 独资 |
| 振昌祥 | 24000 | 7 | 配给 | 石油、火柴 | 天津 | 本市及周边县 | 合资 2 |
| 裕记公 | 30000 | 8 | 配给 | 石油、火柴 | 天津 | 本市 | 合资 3 |
| 元兴成 | 32000 | 19 | 卸卖及小卖 | 土产杂货 | 天津 3、石门 | 本市、高阳、安国、定县、徐水 | 独资 |
| 涌源号 | 40000 | 19 | 卸卖及零售 | 土产杂货、酱园 | 天津 5 | 高阳 3、博野 1、定县 2、蠡县 3、本市 | 独资 |
| 全顺合 | 40000 | 35 | 卸卖及小卖 | 土产杂货、酱园 | 天津 6、本市 | 高阳 2、蠡县 2、徐水 2、天津 2、本市 | 独资 |
| 恒源号 | 40000 | 20 | 卸卖及小卖、 火柴配给 | 火柴、土产杂货、 酱园 | 天津 7、北京 2 | 徐水 1、定县 1、东长寿 1、本市 | 合资 2 |
| 庆兴裕 | 40000 | 11 | 卸卖及小卖 | 土产杂货、酱园 | 天津 5 | 本市 8、高阳 1、徐水 1、蠡县 1、定县 1 | 合资 4 |
| 同兴裕 | 60000 | 8 | 配给 | 石油、火柴 | 天津 | 本市及周边县 | 合资 5 |

注：1. “资本构成”一栏中数字为股东数目。

②“名册”中进、销货内容填写非常详细，往来商号名称及其所在地都有清晰记载，限于篇幅，作者只保留地区而舍去了商号名称；进货地及销货地后边数字为当地与该号有贸易往来的商号数目，未标注数字的是原文件中没有记载。

二、“名册”所反映出的 保定市商业情况

(一) 保定杂货业概况

1. 经营范围

据“名册”记录，经营的商品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石油、^① 火柴、肥皂等当时所谓的“洋杂货”；另一类则是“土杂货”，大致有海参、鱼翅、鱿鱼、虾酱、木耳等海味山货，酱油、醋、咸菜、花椒、大料等食用调味品及冥纸、金箔、账本簿记、竹筷等其他杂类。

我国传统商业与手工业往往不分家，即所谓“前店后厂”，保定杂货业继承了这一特征，普遍兼营酱园，全行 22 家商号中兼营酱园的有 11 家之多。^② 酱园即酿制面酱、酱油、醋、咸菜之类产品的手工作坊，它在传统酿造业中地位仅次于酒坊。酱园多分布于经济发达地区，而酒坊则星罗棋布地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大小城镇。^③ 这是因为，咸菜、醋类产品一般家庭都可以自制，商品率较低。当然，各地的消费习惯也会对酱园分布产生一定影响。保定面酱、酱菜在周边乃至华北地区久负盛名，属于著名地方特产，当地民谚有“保定有三宝，铁球、面酱、春不老”之说。保定杂货业的酱园虽多属兼营，但规模并不小，如全顺合的酱园规模有大缸 2000 多口；酱园业中号称第二大的魁盛鸿，规模也有大缸 2000 多口；庆兴裕的酱园较小，也有 200 口大缸；一般中小商号则有 50 至 800 口大缸。像全顺合这样的商号，很难说它的主营业务是什么，因而在一些老人对保定酱业的回忆中，杂货业和酱园业之间界限很模糊。在他们的回忆中，酱园业商号主要有三大类，兼营酱园的杂货业商号是其中之一。^④

2. 经营类别及规模

保定杂货业内商号规模大部分属于中等，全行业除金成元外，经营类别基本都是“配给”、“卸卖及小卖”。日伪当局为应对日益窘迫的时局，在占领区内实施物资配给制度，“名册”中“配给”显然指的是这些商号是日伪指定的配给店。“卸卖”即长途贩运，^⑤ “小卖”则

是指零售。此外“名册”中进、销货渠道记录显示杂货业各号大多从天津进货，供应本市市民或周边县区商号，这意味着它们也经营着一定的批发业务。^⑥

再来看经营规模。营业资本额是最适于量化经营规模的指标，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账面记载未必真实；雇佣人员数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规模，且有易量化而不易作伪的优点。如果能将营业资本额与雇佣人数结合使用，效果会更好。

如表 2 所示，全行业平均资本达到 2 万元左右、平均雇工 14 人，这个规模当然不能跟大城市的新式大型商业企业相比，但在传统的旧式商业中算是不小的。巫宝三先生曾估计 1933 年前后，江苏、广东、河北等南北 16 省商号雇员平均为 5.24 人；吴太昌先生认为这一估计过高，他使用《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得出的结论是 1952 年全国商号平均从业人员为 1.19 人^⑦（学界一般认为 1952 年是社会经济恢复到解放前最高水平的一年）。1933 年不能算是经济形势很好的时期，但肯定比 1943 年要好。保定杂货业能在这样糟糕的年景达到平均雇工 14 人，可见其商号规模相对而言还是较大的。

配给类的 5 家商号，资本规模明显高于其他商号。因为它们拥有日伪当局指定特许的专营权，负责全部周边地区供应，在市场上处于典型的“寡头垄断”地位；其他 17 家商号则没

① 石油一般并不直接民用，保定及周围也没有炼油企业，因此此处“石油”应当是指煤油等石油类产品。

② “保定市杂货业同业公会商店字号表”（1943 年），“保定商会档案”第 2 卷第 1 册，第 459 页。

③ 刘克祥、吴太昌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 1927~1937》，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986 页。

④ 晓舟、恩厚：《保定酱业的发展》，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河北文史集萃·经济卷》，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53 页。

⑤ “经营运送取报者，即为卸卖商人”，参见天津人民出版社《调查商务习惯答案》，《天津商会档案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909 页。

⑥ 当时还有“杂货业小卖商”一行，即沿街叫卖的街头摊贩，共 117 家，大概也都是从杂货业商号中进货。

⑦ 巫宝三、吴太昌主编《中国近代商业史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47 页。

有这种特权。考虑到保定只是中小城市，而且还有部分行外兼营商号，显然其行内竞争比较激烈。在表 2 中，资本金和员工数量的离散系数不算很大，说明各商号间的规模比较均一。

表 2 杂货业商号经营规模对照表

| | 商号数 | 总资本 | 平均资本 | 员工人数 | 平均员工人数 | 人均资本 | 资本离散系数 | 员工离散系数 |
|-------|-----|----------|---------|-------|--------|----------|--------|--------|
| 全行业 | 22 | 440900 元 | 20041 元 | 309 人 | 14 人 | 1427 元 | 0.83 | 0.58 |
| 配给类商号 | 5 | 142000 元 | 28400 元 | 31 人 | 6.2 人 | 4508.6 元 | 0.68 | 0.40 |
| 其他商号 | 17 | 298900 元 | 17582 元 | 278 人 | 16.4 人 | 1075.2 元 | 0.83 | 0.43 |

(二)“名册”所反映的企业组织形式

企业组织形式的演进是传统商业向近代商业过渡的重要标尺。虽然公司制等现代企业组织形式早已进入中国，而且早在清末民初，保定就已经出现诸如乾易面粉公司、电灯公司等新式企业，但是直到 1940 年代中期，传统的组织经营方式依旧占据绝对优势地位，采用现代组织形式的企业寥寥可数。而就保定杂货业而言，业内商号还只能算是传统商业企业，无论

由此看来，杂货业市场似乎处于一种近似“完全竞争”的状态。当然，这只是基于表象的分析，下文还将结合其他情况作进一步分析。

是出资方式、人员构成，还是经营管理，大都是沿袭了传统做法。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任何进步。从“名册”记载来看，保定杂货业商号在企业组织形式上还是有了一些新特点：^①

一是合伙经营及非自然人股东普遍存在。杂货业全行 22 家商号中有 12 家为合伙经营，约占总数的 55%；其中股东最多者 7 名、最少者 2 名，平均 3.8 名。

表 3 杂货业合伙、独资商号规模对照表

| | 商号个数 | 最大商号资本 | 最小商号资本 | 总资本 | 平均资本 | 平均人数 |
|------|------|---------|--------|----------|---------|--------|
| 合伙商号 | 12 | 60000 元 | 1000 元 | 249800 元 | 20817 元 | 12.8 人 |
| 独资商号 | 10 | 40000 元 | 3100 元 | 191100 元 | 19110 元 | 15.6 人 |

一般来说合伙制企业较之独资企业资金来源更广、规模更大，但是从表 3 来看，在保定杂货业内部这一规律并不明显：合伙制商号的平均资本仅高于独资商号约 9%。即使在合伙制商号内部，股东多也不意味着商号规模大，如聚兴顺、聚泰昌两号各有 7 名股东，但是资本总额分别只有 0.56 万元和 1.3 万元，与行业平均资本额有不小差距；聚兴顺的 7 名股东中 5 名为包姓——包廷琳、包廷准、包廷养、包人敬、包占一，显然是亲友间合伙小本经营。

合伙制商号资本规模一般，但资本关系却很复杂，商号之间相互投资很常见（下文将详细介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传统商号的股东已经具有了现代“法人”制度的某些特征：如元兴成是李成瑞的独资商号，在与同兴裕及

侯润、侯继久两位自然人合股组建庆兴裕时，李成瑞并非是以其个人名义而是以其独资商号名义入股的。他这样做，显然是为了规避某些责任，而这些责任只能由“元兴成”来承担。享有一定的民事权利并能承担一定民事责任正是现代“法人”制的基本特征之一，元兴成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这一特征。

二是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普遍。1940 年代在保定杂货业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全行中大多数商号聘用经理经营，“自东自掌”的只有 4

^①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新特点是相对于近代早期传统商号而言。实际上整个抗战期间，在日伪严酷统治下，百业凋零，经济发展自然无从谈起，因此杂货业商号这些新特点应当是由 1930 年代继承而来。

家。^① 经理人的职业化、社会化趋势相当明显。

在经营方面，经理们的权力很大，股东一般不干预经营活动，商号在同业公会的代表也都是由经理出任。当然也有例外，如涌源号，除委托经理主持柜事外，“财东也参加企业，从事业务工作”。“名册”中并没有提及是否存在“人力股”，但是一些老人曾回忆称：保定酱业“分红制度一般是：财东和劳力（即钱股和人力股）各占40%，公积金20%”。^② 在所引文章中，杂货业与酱业之间没有明显界限，因此可以认为杂货业商号中也通行这种分红制度，换言之，在杂货业中经理们是可以有人力股的。

三是联号经营普遍。联号经营是近代以来兴起的一种较为常见的企业组织经营方式。就保定杂货业的情况而言，基本符合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实用商业词典》所总结出的商业联号经营特征：“因出资之关系，使两个或两个以上之独立商号在业务上订互相联络之契约曰联号。此种组织之起原，由于资本家因欲减少危险，并增加信用。以其财产分别投资于数种事业或同种事业之数店，各店会计完全独立，只于业务上互为联络。而在联号各店，其股东未必完全同一，故并不含有本店及分店之意味，例如大连之油坊，其经营者，每年派遣店员分赴各地采购大豆，于是互相联合以行购入、转运等事，而各号仍保持其独立之会计。”^③

从“名册”记录来看，保定杂货业内形成了3个带有资本关联的联号集团：（1）同兴裕、元兴成、庆兴裕、元兴裕集团：“务本堂侯”等5人出资设立同兴裕；“务本堂侯”又与同兴裕合资设立元兴裕，同时同兴裕又与元兴成合资办庆兴裕。（2）涌源、恒源、庆升恒集团：王伯沛独资4万元开设涌源号，同时又与蓝其伟各出2万元合资开设恒源号；而蓝其伟又与另外二人合资0.94万元开设庆升恒号。（3）全顺合、裕记公集团：贾凯臣独资4万元经营全顺合，同时又与贾茂林、王国瑞合资3万元设立裕记公，两号经理同为冉振川。

上述三个联号集团涉及了9家商号，约占全行业41%；总资本额为30.4万元，约占全行业69%。上文曾提到保定杂货业从表面看起来处于一种近似“完全竞争”状态，但是如果考

虑到联号经营的情况，这一结论显然应当做一定的修正。显而易见，在市场竞争中上述联号商号之间会有某种程度上的合作。这显示，杂货业市场已经跨越了“完全竞争”阶段，正在向“垄断竞争”态势发展。

三、“名册”中所反映的华北地区市场网络

美籍学者郝延平提出，中国在1820年～1880年间经历了一场近代商业“革命”。^④ 不过笔者以为，就华北地区而言，商业“革命”要到20世纪初才显现出来：在19世纪末，随着天津的开埠，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侵入这一地区，但是真正地较大深度地渗透进广大农村地区，则要在1920年代之后了。正如吴承明先生指出的那样，中国国内市场的迅速扩大是在1920年代之后。^⑤ 在此之后，一个以天津口岸为核心、内陆商业城市为结点、广大农村为依托、联系紧密且被深深卷入国际市场体系的华北区域市场才基本形成。保定所在的冀中地区正处于华北区域市场的中心地带。“名册”中详细记载了保定杂货业商号的进销渠道，从个案的角度清晰地反映了冀中地区的商业网络状况。

在保定杂货业这一案例中，给人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天津在这一地区的绝对经济核心地位：除德聚涌之外的所有商号都要从天津进货，然后再销往周边各县。相比之下，北京、石门（今石家庄）的影响则要小得多，行内只有一两家商号与它们有贸易往来。吴太昌、刘兰兮认为，1930年代以后“天津的贸易地位已远远超过了北京，成为华北最大的商埠”，^⑥ “名册”记录完全支持这一论断。

① 这4家商号分别为庆昌公、德聚涌、泰丰庆、聚泰昌，大都是营业资本在万元以下的独资小商号。

② 晓舟、恩厚：《保定酱业的发展》。

③ 陈稼轩：《实用商业词典》，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1107页。

④ 郝延平：《中国近代商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⑤ 吴承明：《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内国际市场》，《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⑥ 刘克祥、吴太昌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第1673页。

冀中区域市场网络的深度与广度以及保定在其中的枢纽地位同样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保定杂货业辐射范围包括周边十多个县、市，最远的顺德在 240 公里之外。杂货业所经营的商品以价值很低的土产杂货为主，此类产品的销售网络都能达到如此水平，这一地区的市场网络深度与广度可见一斑。在抗战后期，市场网络的规模与深度还能保持在如此水平，其全盛时期的状况可想而知。

保定之所以能成为天津与冀中之间的中转枢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有一条水路直通天津。在当时，水运相对于陆路运输的成本优势是相当明显的：据 1930 年代调查，石家庄内河水运运费为 1.2 分每吨公里，修整运河后为 0.8 分每吨公里；火车为 2 分每吨公里；汽车为 30 分每吨公里。^① 石家庄这样，保定也应大致如此。从保定南关码头出发，沿大清河水路北上天津，里程约 200 多公里，两天即可到达。码头与京汉铁路之间又有支线铁路连接，转运十分便捷。清末民初，冀中、山西一带的棉花、煤炭等物资大多要通过保定由水路转运至天津。1920 年代“集于清苑（即保定）的棉花，由铁路运津者约占十分之三，由水路运津者约占十分之七”，^② 当时保定水运之盛可见一斑。1930 年代之后，铁路运输虽然有所进步，但水运依旧是重要的运输方式之一。有统计显示，1939 年 4 月至 1940 年 3 月间津保水路运量仍达到 25 万吨。^③ 除水路之外，保定亦有铁路、公路与天津相连。正因有如此便捷的交通条件，保定直至 1950 年代一直是连接冀中地区与天津的枢纽。这也是保定之所以能在省会迁离之后没有像正定等传统城市那样彻底没落的主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保定杂货业辐射地域分布极不正常，几乎全部集中于保定以南的铁路沿线及保定东南的高阳、安国一带，而京汉铁路以西地区则被完全排除在外。“名册”中记载的 13 个销货地中有 9 个位于京汉铁路沿线。最北端的徐水距保定约 20 公里；最南端是 240 公里之外的顺德。不在铁路沿线的只有高阳、蠡县、安国、博野 4 县，全部集中于保定东南方 40~50 公里范围内。

如果单是铁路以东地区与保定间联系较之

铁路以西更密切，可以用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以及交通条件差异等因素来解释。高阳、蠡县是传统的棉纺手工业发达地区，安国更是有“药都”之称，经济发达，与保定、天津素来联系密切。这一带虽不在铁路沿线，但河网密布，又有保沧（州）、保安（国）等公路网及汽车运输公司，交通便捷。而铁路以西的满城、唐县、曲阳、阜平等县多地处山区、半山区，无论是经济发达程度还是交通条件，都要差很多。因此高阳、蠡县一带与保定的经济联系更密切也在情理之中。但是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铁路以西地区被完全排斥在市场之外。笔者在查阅了一些档案材料后，认为日伪政府的经济“统制”政策是出现这种市场残破现象的根本原因。抗战爆发后，表面上日军迅速占领了中国大片国土，但是在中国人民英勇抗击下，日军实际控制的只不过是交通沿线和一些要点地区，广大的农村地区则依旧控制在中国人民手中。为了从经济上绞杀抗日根据地和加强掠夺，日伪当局制定了各种严格措施来限制商品流通，例如在统治区内组织各行业“移出入组合”、实行“移出入”报审许可制度等。对于其统治以外地区，则一般都严厉禁止货物流出。保定一带京汉铁路以西地区多属太行山东麓，是基本处于“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的控制之下，更是日伪防范最为严厉的地区。下面是笔者在“保定商会档案”中发现的一份伪保定公署于 1943 年 12 月发布的关于严禁向铁路以西输出物资的“政府令”，可以清楚地说明问题：“河北省政府警字第三八一号密令内开：查冀西山敌人经此次盟军冀西作战及收集敌区物品之打击，现已陷于苦境，该敌方目下正拟狂奔吸收我方物资。兹为防止一切物资之流出计，规定冀西山经济封锁计划，特于京汉线及其西方一带为封锁遮断地区，……凡本市内一切货物，

① 汪胡桢：《民船之运输成本》，《交通杂志》第 3 卷第 3 期（1935 年 1 月）。

② 曲直生：《河北棉花之出产及贩运》，商务印书馆 1931 年版，第 141 页。

③ 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北省志·交通志》，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42 页。

除按规定冀西物资搬运限制第一类绝对禁止流动,及第三类前之规定外,其余任何物品无本署发给之搬出许可证书,绝不准其搬运,否则不论数量多寡即以通敌论罪……”^①在这种情况下,铁路以西地区完全被排除在杂货业辐射区域之外,自然一点都不奇怪。这一案例所显示出的日伪对冀中经济的破坏还仅仅是冰山一角,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言。

四、结语

“名册”展示了一幅以灰暗为主色调的抗战后期保定经济画卷,从中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日本侵略者对华北社会经济的摧残。不过本文的用意并不仅在于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罪恶,笔者更希望的是,通过这幅残卷能对保定乃至华北地区近代经济发展趋势有更清晰的认识。

综上所述,笔者得出的结论是:(1)冀中地区经济的市场一体化程度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大加深了,市场经济因素已经极大地渗入了这一地区,这一点在杂货业的市场网络中反映得非常清晰;(2)这种市场一体化或者说市场经济因素的渗透更多是一种被动反应,这一点在保定杂货业企业的发展水平中体现得更突出。保定杂货业较之近代早期传统商业,无论是在经营方式、企业组织形式还是市场网络方面都有所进步;但这些进步更多地是来自于外部技术进步的刺激,如交通、通信等,而对于制度层面的反映则很有限,即杂货业的进步并非内生型的。1940年代的保定杂货业还带有强烈的传统商业气息,距离近代商业仍有相当

距离。杂货业是近代保定这个典型的内陆商业城市的一个缩影,可以说在1940年代中期,传统的旧式商业在保定经济中仍占据绝对优势,这与仅在200公里之外的天津的“洋味十足”形成鲜明对比。这也是近代冀中地区被动卷入世界经济体系、畸形发展的一个有力的例证。

[导师魏明孔教授点评]

发掘新材料是经济史研究学术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笔者有幸于2008年12月主持鉴定由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和河北大学学位与学科建设处共同主办的“整理出版‘保定商会档案’项目专家论证会”。“保定商会档案”的整理和出版,无疑会推动商业史的研究,必定泽及学林、惠及后世,学术界期待着其尽快出版。唐晔同学利用尚未公开出版的“保定商会档案·保定杂货业同业公会商店名簿底册”并配合其他史料,对1940年代中期保定地区的商业状况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认为当时冀中地区的市场一体化程度在加深,尽管这种市场因素的渗透是一种被动反应。该文对于认识1940年代保定地区乃至华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尤其商业的网络格局,是有一定裨益的。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2008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姣娜

^① “保定商会档案”第4卷,第337~340页。

Probe into the Trade of Baoding in the Later Stage of Anti-Japan War

—Centering on *The Directory of Baoding's Grocery Industry Association* in 1944

Tang Ye

Abstract: *The Directory of Baoding's Grocery Industry Associati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reflects the progress of the trade of Baoding in enterprises organization and market network in the mid-20th century. It indicates that Jizhong region is involved deeply in the market integration. However, the penetration of market forces is more of a passive response resulting from the impact of external technological advances.

Key words: in the later stage of Anti-Japan War; grocery; Baoding; trade